史 学 研 究

约翰·克里索斯托的古代社会正义理想

——来自考茨基、卢森堡的评价及其同代人的见解

陈 莹 雪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卡尔·考茨基是较早系统运用唯物史观重构早期基督教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原初基督教会是穷人教会,其成员的财富共有理想在特定的意义上具有"共产主义"属性。尽管原初教会的财富共有模式并没有在实践中长久持续,但这种理想还是被后来的基督教父传承和保留,这方面最重要的证据来自著名的希腊教父约翰·克里索斯托为《使徒行传》所做的一篇布道词。基于同一篇布道词,罗莎·卢森堡与考茨基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约翰等教父可以被视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他们的社会正义理想同原初教会的类似观念一样是消费型共有模式,因其自身的经济弱点必将消亡。与考茨基和卢森堡的论断截然相反的是,同一时期的天主教学者普遍认为不存在"教父共产主义",教父们也不主张财富共有,他们更倾向于从宗教道德劝勉而不是经济学角度解读约翰的布道词。围绕约翰这篇布道展开的争论集中体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与基督教传统的激烈交锋。争论双方的态度经常是善意和开放的,但是对话双方都在某种程度上误读或忽视了对方立场中的一些关键元素,带来的冲突在整体上要大于相互理解。

关键词: 约翰·克里索斯托;原初基督教会;财富共有;考茨基;卢森堡

中图分类号: K 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1)02-0141-11

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是四五世纪基督教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主教之一,曾任罗马帝国东部两大主教区安条克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约翰不仅是东正教传统的主要奠基人,而且其权威也得到了西方天主教会的认可,事实上,恰是西方拉丁人最早赋予了约翰"金嘴"的绰号,以彰显他卓越的演讲才华。①

20世纪约翰思想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德国学者鲍尔(John Baur),在他为约翰所写的经典学术传记《约翰·克里索斯托与他的时代》中指出,与其他希腊教父不同的是,约翰在基督教教义方面并无显著贡献,但是他却十分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②尤其热衷探讨关涉社会正义与公平的贫富差距,救济穷人和私有财产等问题。③

事实上,早在鲍尔之前,同在德语学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活跃领导者——卡尔·考茨基就已捕捉到了约翰的这一特点。在他借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撰写的两部著作

收稿日期: 2020-09-26

作者简介: 陈莹雪,女,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大学人才启动项目——古典晚期希腊教父论私有财产与社会公平"阶段性成果。

① W.Mayer, "John Chrysostom", in K.Parry ed., *The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atristics*, (West Sussex: John Wiley&Sons, 2015), 141.

② C. Baur, Johannes *Chrysostomus und seine Zeit*, vol 1, München 1929,本文使用的是该书的英译本 *John Chrysostom and His Time*, vol1, trans by Sr. M. Gonzaga, (Westminster: The Newman Press, 1959), 373。

③ C. Baur , *John Chrysostom and His Time*, 377-385.

《现代社会主义先驱》①和《基督教之基础》②中,考茨基认为约翰的思想中保留了原初基督教会③所主张的财富共有。就在考茨基的著述发表期间,德语学界来自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学者就包括约翰在内的关心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督教父,其思想中是否包含社会主义因素,教父们是否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倡导者,曾展开过激烈讨论。以往学界对考茨基的基督教论述研究颇丰④,但是对他的言论在当时所引发的讨论尤其是天主教学者的回应并未给予足够关注。因此,本文将以 1895 年(也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首版时间)至 20 世纪 20 年代出版的相关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考察考茨基认定的教父思想中的财富共有观念所带来的争议。虽然本文将聚焦于围绕约翰的种种争论,但笔者相信,约翰在诸教父中特别凸显的对社会经济问题的高度关注使得围绕他而展开的争论也更具代表性,这些争论折射的事实上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处于急速上升期的社会主义思潮与基督教传统的激烈交锋。

一、考茨基论约翰

在考茨基之前,恩格斯也曾论及原初基督教会的历史,他具有开创意义的诠释工作主要体现在三篇文章中:《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启示录》《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尤其是他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指出的原初基督教会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的共同点⑤,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考茨基以及后文将要提到的卢森堡的相关论述。⑥ 虽然恩格斯曾认为原初基督教会的主要组成人员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⑦,但他随后在与考茨基的通信中修正了这一观点,认为基督教最初是从罗马帝国的城市发展起来“并且找到最初一批信徒”,⑧而这与考茨基所认为的原初教会成员大多是城市无产者不谋而合。相比恩格斯与卢森堡的简短论述,考茨基在他的两部著作中运用唯物史观较为系统地重建了原初基督教会的历史。

1908 年,考茨基出版了《基督教之基础》。该书出版后反响巨大,不仅旋即收到 23 份书评,而且在

---

① Karl Kautsky, *Die Vorläufer des neueren Sozialismus*, 1. Band, 1. Theil, (Stuggart: Verlag von J. H. W. Dietz,1895).

② Karl Kautsky, *Der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 *Eine historische Untersuchung*, (Stuttgart: Verlag von J.H.W. Dietz Nachf,1908.) 本文主要使用的是该书的中译本(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叶启芳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55 年版),并在必要时辅以德语原本。

③ 本文所谓“原初基督教会”是指新约圣经中所描述的基督教会最初的发展阶段。

④ 相关研究参见 Delos B. Mackown, *The Classical Marxist Critiques of Religion*: *Marx*, *Engels*, *Lenin*, *Kautsky*,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5), 122-157; James Bentley, *Between Marx and Christ*, *The Dialogue in German-Speaking Europe*, 1870-1970 ,(London: Verso, 1982), 36-59; Roland Boer, “The Actuality of Karl Kautsky, on Materialist Reconstructions of Ancient Israel and Early Christianity”, *The Bible and Critical Theory*, vol.3, No.3, 2007, 40-40.23, *Criticism of Religion on Marxism and Theology*, *II*, (Leiden: Brill,2009), 91-119; -, *Red Theology*: *On the Christian Communist Tradition*, (Leiden:Brill,2019),10-27;丹尼尔·威廉姆斯:《考茨基关于古代基督教的社会历史观》,何曼译,《基督教文化学刊》第 24 辑,2010 年,第 50—51 页;朱彦明:《卢森堡与考茨基关于原始基督教的诠释》,《基督宗教研究》第 26 辑,2019 年,第 2—19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75—477、488 页。

⑥ 相关参见朱彦明:《卢森堡与考茨基关于原始基督教的诠释》,《基督宗教研究》第 26 辑,2019 年,第 6—7 页;亦见 Roland Boer, *Red Theology*: *On the Christian Communist Tradition*, 39.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第 475 页。

⑧ 恩格斯的这封书信写于 1894 年 7 月 28 日,书信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64—266 页,此处见第 265 页。

之后 25 年期间被翻译成五国文字,①深刻影响了之后几代欧洲社会主义者对基督教的认识。②

考茨基认为原初基督教会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教会成员大多是城市无产阶级,③他们对富人充满了阶级仇恨。④ 就内部组织而言,原始基督教以共有财产为目的并实践了共有生活,支持这一结论的最有力证据来自《使徒行传》第二及第四章的相关经文,这些经文描述了一个凡物公用,按需分配的基督教社团:

>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传 2:44-45)
>
>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传 4:32-35)

考茨基认为原初基督教会的这种财富共有的实践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⑤但是基督教会并没有长期维持财富共有的组织方式,主要因为这是一种消费型共有模式,这与现代社会主义者主张的旨在改变社会不平等结构的生产型共有模式有着根本区别。⑥ 消费型共有模式只在物质分配和消费环节实现财富共有。⑦ 它的弊端是轻视生产,提倡节制物欲,⑧并不共有生产资料。⑨在早期基督教会的实践中,这种财产共有模式往往表现为"公膳"与"互济"。⑩ 消费型共有模式不能大规模推广,只适用于一个小团体。⑪ 因为随着教会的发展,教会内无产者数量激增,迫于互济的需要,教会需要吸纳更多的富人以提供救济所需的财富,⑫而越来越多有产者的加入逐渐改变了教会的无产阶级属性,阶级仇恨也被弱化,⑬财富共有渐渐衰弱无力。⑭ 而在第四个世纪,基督教获得罗马国教地位,转而成为"国家的统治势力",主教们成为新兴的统治阶级,济贫工作虽在,但教会的财富共有属性完全消减了。⑮ 正如学者威廉姆斯所指出的,考茨基这里给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原初教会共有模式的"遗失故事",建立了主教等级制和教义权威的教会遗失了祂的"黄金时代",即教会实践共有理想的时期。⑯ 考虑到考茨基所写的原初基督教会的历史其实是一段科学社会主义的前史,"遗失故事"的叙事模式就并不令人意外,相比科学社会主义,原初基督教会所出现的这种财富共有因其固有的经济弱点,注定只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那么约翰在这个遗失故事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简单而言,约翰是教会失去了财富共有属性之后却

---

① James Bentley, *Between Marx and Christ*, *The Dialogue in German-Speaking Europe*, 1870-1970 ,(London: Verso, 1982), 43.

② James Bentley, *Between Marx and Christ*, 44.

③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 327—331 页。

④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 332—336 页。

⑤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 344 页。

⑥ 有关这两种共产主义在考茨基作品中的区别,相关研究可参见 Roland Boer, *Red Theology*,13-14.

⑦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 351 页。

⑧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 351—352 页。

⑨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 423 页。

⑩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 424 页。

⑪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 422 页。

⑫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 424—425 页。

⑬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 426 页。

⑭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 428 页。

⑮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 429 页。

⑯ 丹尼尔·威廉姆斯:《考茨基关于古代基督教的社会历史观》,何曼译,《基督教文化学刊》,第 24 辑,2010 年,第 50—51 页。

依然怀揣共有理想的人,这集中体现在他为上文提到的《使徒行传》第四章所做的布道词之中,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约翰这篇布道词是考茨基作品中极少数的直接引用的教父原文,②而早在《基督教之基础》出版之前,他已然在《现代社会主义先驱》一书中引用了同一段文本,这足以证明这段布道词在考茨基思想发展过程中持续而稳定的影响力:

> “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这是因为他们都极愿意给与,以致没有人贫困。他们并没有捐一部分,却给自己保留一部分,而是将自己所有全部捐出。他们废除了不平等,生活于极大的富足之中。而且他们以一种值得称赞的方式进行,他们不敢将物(直接)赠与有需要的人,而是将其放在使徒脚前,让使徒成为财富的管理者和主人,以便大家消费的是公共的而不是个人财富。
>
> 如果今时今日我们也做同样的事,那么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我们都会生活得更幸福。
>
> ……
>
>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种情景:人人都将其所有捐赠为公共财富,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没有人会对此有异议,你们认为会收集到多少银钱?我揣测如果每个人都捐出他的钱、田产、房舍,可能可以收集到一百万磅黄金,也可能二倍、三倍于此。那么请告诉我,我们的城市(君士坦丁堡)有多少人?有多少基督徒,不到十万人?还有那么多异教徒和犹太人!能收集到成千上万磅黄金!我们有多少穷人?我相信他们不会多于五千人?那么每日喂养他们又需要多少呢?如果他们共餐,那么支出不会特别巨大。我们当如何处置这笔巨额财富呢?③ 你相信它会消耗殆尽吗?……如果这样做在三千或五千早期基督徒④那里取得了辉煌成就,没有人匮乏,那么如此之多的人会岂不会得到更大的成功?哪一个新加入的会不捐赠?
>
> 分散是极大的浪费并且会产生贫困。让我们设想有一个家庭,夫妻二人有十个孩子,妇人纺织,男人在市场中⑤求生计。那么哪种方式需要更多开销?是共同居住还是分居?很显然,分居开销更大。如果十个孩子分家,他们需要十栋房子,十张桌子,十个仆人和其他类似的成倍的开支。那么如果是一大群奴隶,情况又当如何?人们难道不是为了节约成本让他们一桌吃饭?分散总是诱发浪费,合居便会带来积累。修道院的修士目前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就像从前的虔诚信徒一样。有谁因此饿死啦?有谁不富有满足呢?但有些人却惧怕这种生活胜于坠入无穷的大海。

在考茨基看来,约翰的这段文字是原初教会财富共有理想依然存续于后来教会的最令人称奇的证据之一 。⑥ 而且约翰之于早期基督教徒的优势在于他对原初教会的共有模式有着更周详的考虑和更细致的描述,清晰地指明了原初教会的财富共有属性。⑦ 另外,约翰的经注并不局限于阐明《使徒行传》的经文,他还试图通过计算共同生活比单独成立家庭更能节约成本来劝说他的听众接受《使徒行传》所描

---

① 这篇布道词见 Karl Kautsky, *Die Vorläufer des neueren Sozialismus*, 29-31 以及 karl kautsky, *Der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 *Eine historische Untersuchung*, 348-350 本文汉语译文以考茨基的德语译文为基础,但会提示其与希腊语原文有明显出入之处。约翰布道词希腊语原文见 John Chrysostom, “In Acta Apostolorum (homiliae XI)”,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Graeca*) (*MPG*), vol.60, Paris, 1857-1866, 96-98.

② 除了约翰的布道词之外,考茨基在《现代基督教先驱》中还直接引用了一小段纳西盎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的作品, 参见 Karl Kautsky, *Die Vorläufer des neueren Sozialismus*, 29.

③ 考茨基的译文 Was werden wir also mit unserem riesigen Schatz anfangen? 偏离了希腊语原意 Τί οὖν, φησίν, ἐμέλλομεν ποιεῖν μετὰ τὸ ἀναλωθῆναι (有人问钱花光了我们怎么办?)

④ “早期基督徒”不见于约翰原文,是考茨基的解释。

⑤ 约翰原文此处为 ὁ δὲ ἔξωθεν φερέτω προσόδους(外出谋生计), 考茨基将其译为 er sucht auf dem Markte seinen Unterhalt(从市场中谋生计)

⑥ Karl Kautsky, *Die Vorläufer des neueren Sozialismus*, 29, “Eines der merkwürdigsten Zeugnisse für den kommunistischen Charakter des Urchristenthums findet sich aber in den Schriften des heiligen Johannes.”

⑦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 339 页。

述的财富共有的生活方式,因此考茨基认为这是一篇“冷静的,纯粹经济学的,没有任何宗教热情的”布道。① 但他也指出,约翰这里建议君士坦丁堡教众实践的财富共有仍然是“一种消费型而不是生产型的共有模式”,②约翰丝毫没有提及谁应该为他所设想的共有财富的社团生产所需要的一切。约翰所处时代的基督教会早已远离了原初基督教会的财富共有本质,他的设想正如他自己所不得不承认的是人们惧怕的生活,很难得以实现。③

由上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解读《使徒行传》相关章节还是引用约翰的布道对其加以佐证,考茨基都指明了他所认为的基督教财富共有的通病,这就是作为一种消费型共有模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生产问题,注定不能长久,而对于后使徒时代已获得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会来说,这种财富共有只是约翰所设想的一种不可实现的理想。

二、罗莎·卢森堡论约翰

考茨基并不是他那个时代唯一一个对约翰这段布道词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考茨基的《现代社会主义先驱》问世十年后的 1905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家罗莎·卢森堡(Losa Luxemberg)发表了她的《社会主义与教会》④。这篇文章旨在指导那些虽为社会民主党成员但同时有着基督教信仰的波兰工人如何应对来自教会的责难。⑤ 卢森堡试图证明尽管天主教会反感且抵制社会主义运动,但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的本质并不矛盾。相反,恰是当下正在进行的旨在结束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在各国建立平等、自由、博爱的社会主义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践了耶稣在福音书中的教导,继承了原初基督教会的衣钵,而批评社会主义的教士们却堕落为剥削阶级的代言人,⑥这正如她的尖锐批评:“教士指责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要推行‘共产主义’,即共同占有尘世的财富。首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教士谴责‘共产主义’,其实就是在谴责最早的基督教使徒,因为他们正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⑦而她的文章就是要从历史中找寻基督教会失去财富共有属性的根源。

与考茨基相仿,卢森堡对原初教会财富共有属性的判定同样也来自《使徒行传》的相关章节,⑧她给我们讲述的也依然是一个“遗失”故事。但约翰这些基督教父却是这个教会堕落故事中的“逆行者”,“教父们长期以来一直用激烈的词句与这种侵入基督教团体的社会不平等作斗争,谴责富人,呼吁他们回到使徒提倡的那种财富共有的生活中。”⑨为证明教父们有回到原初教会共有生活的热切愿望,卢森堡一字不漏地引用了上文提到的约翰的布道词,并得出了与考茨基一样的悲剧性结论:“约翰的激烈布道没有任何结果。没有人尝试在君士坦丁堡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推行财富共有。同时随着基督教的扩张,成为四世纪初的罗马的主导宗教,教徒日益远离使徒的范例。教徒团体内部贫富之间的不平等也日

---

① Karl Kautsky, *Die Vorläufer des neueren Sozialismus*, 31“Diese so nüchterne, rein ökonomische, von jeder religiösen Überschwänglichkeit freie Predigt.”

② Karl Kautsky, *Die Vorläufer des neueren Sozialismus*, 31“daß er nur ein Kommunismus des Konsumirens, nicht des Produzirens war.”

③ Karl Kautsky, *Die Vorläufer des neueren Sozialismus*, 31.

④ 卢森堡此作最早由波兰语写成,本文使用的是英译本,Rosa Luxemburg, “Socialism and the Churches”, in Mary-Alice Waters ed., *Rosa Luxemburg Speaks*, 131-152.

⑤ Roland Boer, *Red Theology*, 31.

⑥ Rosa Luxemburg, “Socialism and the Churches”, 132-134.

⑦⑧ Rosa Luxemburg, “Socialism and the Churches”, 134.

⑨ Rosa Luxemburg, “Socialism and the Churches”, 139.

益增大。”①

在卢森堡看来,约翰愿望落空说到底还是因为他所主张的是一种消费型共有模式。这种并不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共有模式,劳动创造的财富必然也不能被共有,维系这样的共有模式只能通过“施舍”也就是富人让渡一部分财富给穷人,但只依赖富人的恩赐根本不可能消灭阶级差别,所以“基督教的共有模式不但不能改变和改善社会关系,而且这种模式也难以为继”。②她同时也指出以教父时代的经济基础,不可能出现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也不可能实现共同劳动,美妙的布道终究敌不过经济条件的局限,“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没有消除劳动和生产资料的不平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消除消费品分配不平等的努力毫无作用。教父们回到财富共有生活的号召也无人响应”。③ 然而,基督教共有模式理想与实践的破灭在卢森堡看来更好地凸显了当下社会民主党人的优势,“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基督教‘共产主义者’(Christian communists)之间的不同,社会民主党人说:我们不需要富人与穷人分享财富,我们也不需要施舍与救济,因为这些东西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我们不需要富人跟穷人分享,我们要彻底消灭贫富差别”。④

从考茨基和卢森堡对约翰布道词的评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些相同观点:他们都认为《使徒行传》中所描绘的原初基督教会曾实践财富共有,也均以消费型共有模式和生产型共有模式的区分作为基本理论工具,分析指出原初教会的财富共有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型共有模式”,依赖有产者的救济与施舍,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生产关系,因此必将消亡。但约翰这些教父们对原初基督教会的向往,对他们所处时代富有阶层的批判,证明了即便是这种共有实践已不复存在的年代,教父们依然拥有财富共有的理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可以算作现代社会主义者的先驱。

三、来自天主教学者的异议

就在考茨基与卢森堡作品发表的年代,德语学界,来自天主教会的学者们也撰写了多部讨论基督教父社会经济思想的著作。⑤ 本文将选取三部这样的作品,它们分别是奥地利学者、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社会党成员,后来又担任奥地利总理的塞佩尔(Ignaz Seipel,1876-1932)所著的《教父经济伦理学说》(1907)⑥,德国学者席琳(Otto Schilling, 1874-1956)的《古代教会文献中的财产与所有制》⑦(1908)以及德国学者梅福特(Franz Meffert, 1868-1944)的《耶稣与教父的“共产主义”》⑧(1922)。之所以选取这三部作品,首先是因为他们都不约而同引用并分析了约翰的这篇布道词,正如我们前文的论述,恰是这篇布道词引起了两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兴趣,笔者相信对同一篇教父文献的不同解读可以向我们集中展示两派在理解基督教历史与传统中的一些核心分歧。另外,我们注意到这三本由天主教学者所撰写的著作,均发表于教宗利奥十三(Pope Leo XIII)的 1891 年《劳工通谕》(*Rerum Novarum*)之后,而后者的“主要内容在于捍卫私有权和质疑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⑨ 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这三本

---

① Rosa Luxemburg,“Socialism and the Churches”,141.

② Rosa Luxemburg,“Socialism and the Churches”,138.

③ Rosa Luxemburg,“Socialism and the Churches”,142.

④ Rosa Luxemburg,“Socialism and the Churches”,138.

⑤ 相关学说史梳理可参见 L.Wm.Countryman, *The Rich Christian in the Church of the Early Empire*, *Contradictions and Accommodations*, (New York and Toronto: The Edwin Mellen Press,1980), 6-8.

⑥ Ignaz Seipel, *Die Wirthschaftsethischen Lehren Kirchenväter*, (Wien: Verlag von Mayer,1907).

⑦ Otto Schilling, *Reichtum und Eigentum in der altkirchlichen Literatur*, (Freiburg: Herdersche Verlagshandlung,1908)

⑧ Franz Meffert, *Der “Kommunismus” der Jesu und der Kircheväter*,(München: Volksvereins-Verlag, 1922).

⑨ 彭小瑜:《关注劳工“最近的目的和利益”——利奥十三世 1891 年〈劳工通谕〉以及美国天主教会的回应》,《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 期,第 141 页。

著作或在当时就被认为深受《劳工通谕》的影响,带有护教使命;①或事实上是在《劳工通谕》所拟定的基调下展开写作,旨在质疑、批评与反驳社会主义者对基督教传统的“误读”。② 因此,很大程度上它们可以更好地反映当时天主教会的主流观点,诠释天主教会的权威立场。

塞佩尔认为总体而言并没有哪一位教父是真正主张废除私有制的,教父作品中那些疑似“共产主义”的片段,其写作目的并不是要建立凡物共有的经济秩序,实现物质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更多的只是一种道德劝勉(sittliche Mahnung),鼓励富人正确使用财富,更多关心穷人。③ 约翰也不构成例外,如果比较全方位地考察他的思想,就会发现他并不反对人们持有私有财产。④ 但他也指出,约翰的这篇布道词确有异于其他教父同类作品的特点,这就是约翰从经济角度针对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君士坦丁堡教众)给出了更具体的消除不同阶级差别的建议,⑤而且《使徒行传》中所描写的原初教会也确实被约翰理解为是财富共有的。⑥ 然而在塞佩尔看来,约翰对君士坦丁堡教众的建议仅仅是停留在语词上的一种构想,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真正的去实践,更不会去触碰既定的社会秩序。⑦ 在社会主义者所关心的财富共有要素之外,塞佩尔也特别向读者指明了这篇布道词对修道生活的提及——修士放弃私有财产,靠自己的劳动所得过集体生活——这样的生活符合福音书的教导也是约翰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其实约翰向君士坦丁堡教众推广的正是修道院式的生活,他深知实践这样的生活最大的障碍不是经济因素而是人的意志。⑧ 另外,塞佩尔也指出约翰倡导君士坦丁堡人尽可能多地捐赠财产并不是为了过平均主义的生活,而是“施舍”(Nächstenliebe)本身就是一种基督教的美德。约翰认为如果基督徒可以把这种美德发挥到极致,也就是所有人倾其所有,那么俗世的一切经济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只不过约翰也意识到这会让个体做出极大的牺牲,因此并不对所有人强求,只建议那些道德上有明显优势的人。⑨

就在塞佩尔的《教父经济伦理学说》出版第二年,德国天主教学者席琳出版了他的《古代教会文献中的财产与所有制》。在这部作品中,席琳系统梳理了从二世纪直到中世纪的主要基督教作家有关财产和所有制的讨论,因其详实的史料和相对公允的治学态度,时至今日,这部著作仍有一定学术价值。⑩ 与塞佩尔相仿,席琳也不认为约翰在这篇备受争议的布道词中否定了私有制和私有财产。⑪ 在他看来约翰只不过是在向君士坦丁堡人展示一种他心目中基于宗教信念的理想国度,⑫用约翰的话来说就是“天使之国”⑬,因此约翰的提议并不具有社会推广意义和制度变革色彩,而是为了纠正道德问题,“像柏拉图一样,这种理想的财富共有生活似乎是一种对拜金主义,对某些富裕阶层的享乐主义和自私自利

---

① Heinrich Koch, “ Review: *Die wirtschaftsethischen Lehren der Kirchenväter*. Theologische Studien der Leogesellschaft, 18. Heft by Ignaz Seipel; *Reichtum und Eigentum in der altkirchlichen Literatur* by Otto Schilling ”, *Zeitschrift für katholische Theologie*, Vol. 33, No. 3 (1909), 555; 亦见 L.Wm.Countryman, *The Rich Christian in the Church of the Early Empire*, 6-7.

② Franz Meffert, *Der “Kommunismus” der Jesu und der Kircheväter*, 14, 79.

③ Ignaz Seipel, *Die Wirthschaftsethischen Lehren Kirchenväter*, 85-86.

④ Ignaz Seipel, *Die Wirthschaftsethischen Lehren Kirchenväter*, 106-107.

⑤ Ignaz Seipel, *Die Wirthschaftsethischen Lehren Kirchenväter*, 107.

⑥ Ignaz Seipel, *Die Wirthschaftsethischen Lehren Kirchenväter*, 104.

⑦ Ignaz Seipel, *Die Wirthschaftsethischen Lehren Kirchenväter*, 102, 105.

⑧ Ignaz Seipel, *Die Wirthschaftsethischen Lehren Kirchenväter*, 105.

⑨ Ignaz Seipel, *Die Wirthschaftsethischen Lehren Kirchenväter*, 105-106.

⑩ L.Wm.Countryman, *The Rich Christian in the Church of the Early Empire*, 6.

⑪ Otto Schilling, *Reichtum und Eigentum in der altkirchlichen Literatur*, 121.

⑫ Otto Schilling, *Reichtum und Eigentum in der altkirchlichen Literatur*, 120.

⑬ “天使之国”(ἀγγελικὴ πολιτεία),语出 John Chrysostom, “In Acta apostolorum”, *MPG*, vol.60, 65, 见 Otto Schilling, *Reichtum und Eigentum in der altkirchlichen Literatur*, 120.

的回应,总体而言也是对过分看重外在世俗财物的一种批判。”①而且,席琳也指出约翰自知这种生活只适用于少数道德完人。②

以上两部作品,虽有护教色彩,但他们的护教方式只是尽可能详细、清晰地阐明教父思想,并没有就社会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督教诠释提出正面、明确、系统的批判。这方面的工作是由另一位天主教学者梅福特完成的。1922 年,梅福特发表了《耶稣与教父的“共产主义”》一书,这本书的出版晚于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十多年,相比前两位天主教学者,这样的时间差使作者可以充分见证到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教会的冲击力,以及更从容地思考和应对社会主义者的挑战,给出更有针对性的回应。

梅福特开宗明义,表明他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回击来自社会主义的煽动,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常常引用基督教文献,倾向于将耶稣本人或基督教父塑造为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者”。③ 但梅福特认为“教父共产主义”(Kommunismus der Kirchenväter)在历史中并没有存在过而且也是教父们不自知的概念,社会民主党人错用教父思想炮制了这一概念,试图证明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具有相容性,以此蛊惑天主教徒。④ 此外,社会民主党人对教父的利用还表现在他们在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对原初基督教会历史的重构之中,社会民主党人所谓的原初基督教会是无产阶级的教会,实践财富共有只是出于对福音书和保罗书信浮光掠影式的粗浅解读,教父被认为更接近原初教会,他们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强调更能证明原初基督教会的财富共有性质,因此,尽管教父们提倡的不是生产型而是消费型的共有模式,但无疑他们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⑤ 然而在梅福特看来,以上社会民主党人的论证在方法论上有着致命弱点,这就是所谓教父是“共产主义者”的结论主要出于他们对教父作品选择性的使用,完全脱离了这些文本的原始语境,这暴露出他们不仅不能驾驭史料,而且不尊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他们只不过是教父引言的狩猎者(Zitatenjäger),将精心挑选的只言片语拼凑起来,所以他们构建“教父共产主义”的论述从科学角度讲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废纸(Makulatur)。⑥

作为借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系统重构早期基督教会历史的学者,考茨基毫无悬念地成为梅福特的重点批驳对象。梅福特指出考茨基在自己的著作中分析了新旧约的相关章节,对教父作品也有使用,由此摆出科学历史学家的姿态,但是如果仔细考察考茨基论述的文本来源,就会发现他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通病,那就是他们并不愿意花费力气去钻研教父作品。⑦ 考茨基在《现代社会主义先驱》中对教父作品的使用都是参考他人著作的结果,这就是维勒加德勒(F.Villegardelle)于 1846 年发表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史》⑧,但即便是使用二手文献,考茨基也与原著观点存在很大偏差,因为后者认为教父不能被称作“共产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也不是社会主义的。⑨ 也就是说,在梅福特看来,考茨基根本

---

① Otto Schilling, *Reichtum und Eigentum in der altkirchlichen Literatur* ,122.

② Otto Schilling, *Reichtum und Eigentum in der altkirchlichen Literatur* ,123.

③ Franz Meffert, *Der* “*Kommunismus*” *der Jesu und der Kircheväter* ,5.

④ Franz Meffert, *Der* “*Kommunismus*” *der Jesu und der Kircheväter* ,9.

⑤ Franz Meffert, *Der* “*Kommunismus*” *der Jesu und der Kircheväter* ,10.

⑥ Franz Meffert, *Der* “*Kommunismus*” *der Jesu und der Kircheväter* ,10.

⑦ Franz Meffert, *Der* “*Kommunismus*” *der Jesu und der Kircheväter* ,13.

⑧ F.Villegardelle, *Histoire des Idées Sociales Av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Guarin Liberaire, 1846. 维勒加德勒对教父社会主义思想的讨论见该书第四章(第 76-82 页),但值得一提的是维勒加德勒并没有在他的著作中提及约翰的这篇布道词,也没有直接将约翰定义为社会主义者,因此,考茨基对约翰的讨论,其直接本文来源并不是维勒加德勒的这本书。

⑨ Franz Meffert, *Der* “*Kommunismus*” *der Jesu und der Kircheväter* ,13. 事实上,维勒加德勒确实认为一些教父作品包含有“共产主义”思想(idées communistes),参见 F.Villegardelle, *Histoire des Idées Sociales Av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75, 因此,梅福特此处的判断并不十分准确。

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会历史学家。

具体到对约翰那篇布道,梅福特认为考茨基等社会主义者对这个文本最大的误解在于约翰事实上是以修道院的生活方式为参照认识原初教会的生活,也是以修道院为范本,为君士坦丁教众构想了一种财产共有的生活模式,这与社会主义者对原初基督教会的想象有着完全不同的观察视角。① 而且约翰所认为的财富共有生活完全建立在自愿贫穷(freiwillige Armut)之上,只适用于少数德行完美的人。② 梅福特进一步指出,约翰所提倡的修道院式的共有生活只在一个由道德完人组成的社会才可能实现,也就是先有完美的人,然后才会有共有生活,而现代社会主义者却本末倒置,他们希望的是先引入社会主义然后由此创造出完美的人。③

梅福特相比其他两位天主教学者,在为基督教传统辩护,批判社会主义者的基督教诠释方面态度更鲜明,语言表达也更犀利而尖刻。但无疑三位天主教学者的核心论点是一致的,这就是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教父共产主义",包括约翰在内的教父们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也从未否定过私有制。那么如何理解约翰在这篇布道中所提倡的财富共有,他们认为首先这一设想不仅基于圣经中所描述的原初教会,更与当时流行于基督教世界的修道生活密不可分,这是一种建立在修道院模式之上的理想生活,约翰是在劝说他的听众去模仿、追随这种完美的生活模式。虽然在约翰的布道词中,对修道院生活只是一笔带过,但天主教学者却认为这是理解约翰财富共有理想的关键所在。反观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篇布道词的解读,他们丝毫没有理会约翰文中明确提到的修道生活,而考茨基在《基督教之基础》中对修道制度和修道生完全独立于教会传统的分析,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者此处的缄默。考茨基认为不同与城市教会失败的消费型共有模式,修道院是一种比较成功的乡村共有模式,它成功的根本原因不是修士们的宗教虔诚,而是修院共有模式是建立在修士的集体生产而不是单纯的共同消费之上。④ 但是这种共有模式仍然不能被推广,因为修士独身是反婚姻家庭的,⑤而且在实践中,占有大量地产的修道院最终也沦为了一种统治和剥削组织。⑥ 考茨基从经济角度出发分析修院制度,在消费型共有模式"(城市教会)和"生产型共有模式"(乡村修道院)之间制造对立关系,这极有可能会使他相信约翰在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共有设想与修院制并无必然联系。

另一方面,虽然天主教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否定了约翰所提倡的财富共有在社会中被广泛实践的可能,但考茨基、卢森堡认为这是消费型共有模式自身的经济缺陷所导致的必然失败,而天主教学者并不认为不可被推广即是失败,正如他们反复强调的约翰的观点,这种生活是少数道德完美者的选择。虽然约翰在这篇布道词中采用了在教父们中比较罕见的劝说方式,比如计算集体生活的成本更低,但这并不能证明这篇布道词是考茨基所说的纯粹经济的,没有任何宗教热情,正如塞佩尔所分析的,约翰只是想借此劝说人们将"施舍"这一基督教美德最大化,说到底在这篇布道中,约翰仍然是在努力推广一种符合基督教信仰的理想生活。然而"施舍"对于卢森堡来说只是维持消费型共有模式治标不治本的分配手段,对于考茨基来说则是富人得以大量涌入原初教会最终改变其无产阶级属性的罪魁祸首。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天主教学者与考茨基、卢森堡在解读约翰这段布道词时的根本分歧就是:前者倾向于从宗教道德劝勉的角度去体察约翰的用意,而后者更乐于从经济角度出发分析约翰的财富共有愿景。

至于梅福特对社会主义者论述方法的指控以及对他们作品学术价值的贬低,考茨基可能并不会认

---

① Franz Meffert, *Der "Kommunismus" der Jesu und der Kircheväter* ,149.

② Franz Meffert, *Der "Kommunismus" der Jesu und der Kircheväter* ,149.

③ Franz Meffert, *Der "Kommunismus" der Jesu und der Kircheväter* ,150.

④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 459 页。

⑤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 462 页。

⑥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 463 页。

同。考茨基认为虽然他对宗教史的了解比不上职业神学家,且是在社会活动之外抽空写作,但这正是他的优势所在,正因为他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投入,使他可以获得一种职业神学家所不具备的观察视角,并以此去反观原初基督教会的历史。①政治实践和历史研究的结合,可以使他避免各种空论,也可以避免学院派研究的偏见,更多关心垄断学问的有产阶层所不关心的社会底层的历史。② 因此,考茨基坚信“我们的无产者观点实可以使我们比之资产阶级的考察家易于了解原始基督教所同于近代无产阶级运动之诸方面。”③此外,与梅福特的感受不同的是,考茨基并不认为他的研究不尊重历史,相反的,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可以让历史学家发现主导人类历史的线索,避免停留在表面的、局部的、具体的真相之上。④

四、小结与余论

尽管考茨基认为他进行的是历史研究,而且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社会主义运动者的身份能够让他的解读更具洞见,即发现职业神学家意识不到的原初基督教会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点,以及教父作品中主张财富共有的社会主义因素;但来自天主教学者的质疑,在笔者看来依然对他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解读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不仅是梅福特所说的社会主义者对教父作品断章取义,做非历史的解读,事实上天主教学者的护教目的也使他们的写作很难是在完全还原历史。挑战主要在于教父毕竟是基督教传统的权威解释者和传承者,对于他们的作品,是否真的可以像社会主义者一样剥离其宗教前提与语境做经济学角度的解读?这样的解读,在某些情景下可能具有非凡的启发力,但同时也遮蔽了基督教本质的某些重要方面,例如如何正确评价和理解体现邻人之爱的“施舍”以及基督教修道生活的社会示范意义。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考茨基对基督教历史的解读影响力巨大。这一影响在这些作品问世后不久便已突破了欧洲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具体到约翰,我们发现20世纪初举足轻重的古典及拜占庭历史学家布瑞(J. B. Bury)在他的名著《晚期罗马帝国史》中指出:“对约翰来说,上流阶层的生活与受压迫的底层民众的苦难之间形成的对比是如此痛苦的景象,以至于他几乎是一个社会主义者(socialist)。”⑤“他对富人的强烈谴责与现在欧洲社会主义者对富豪阶层的谴责具有相同的意义与价值。”⑥在布瑞的论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考茨基与卢森堡的身影:约翰既是社会主义者,又与现代社会主义者有着相当的关联。

此外,前文提到梅福特曾提醒他的读者要警惕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之间制造相容性,以此蛊惑天主教徒。但他的担忧也从另一个角度提示我们似乎可以更积极地看待考茨基等人对基督教历史立足当下、服务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解读,那就是欧洲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忽视欧洲历史最重要的宗教遗产——基督教,而是试图在自己的意识形态框架内积极与之对话。可以说争论双方的态度经常是善意和开放的,但是对话双方都在某种程度上误读或忽视了对方立场中的一些关键元素,带来的冲突在整体上要大于相互理解。

---

①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10页。

②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11页。

③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14页。

④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14页。

⑤ 布瑞此书首版于1923年,本文使用的是该书1958年的翻印版。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a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8),139.

⑥ J. B. 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 140.

John Chrysostom's Ideal of Ancient Social Justice: Comments from Karl Kautsky and Rosa Luxemburg with Views from their Contemporaries

Chen Yingxue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Karl Kautsky (卡尔·考茨基) was among the first batches of Marxists who systematically appli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rly Christian history. He believed that the primitive Christian church was a church of the poor, whose members' ideal of common possession of wealth was characterized with "communism" in a specific sense. Although the mode of common possession of wealth in the primitive Christian church did not last long in practice, their ideal was inherited and retained by the later Christian church fathers. The most important evidence in this regard came from a sermon written by the famous Greek church father John Chrysostom (约翰·克里索斯托) for *the Acts* (《使徒行传》). Based on the same sermon, Rosa Luxemburg (罗莎·卢森堡) ca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with Karl Kautsky that John Chrysostom and other church fathers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pioneers of modern socialism. Their ideal of social justice was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primitive church fathers, which was a shared consumption mode. But this mode was bound to perish due to its own economic weak point. Contrary to Karl Kautsky and Rosa Luxemburg, their contemporary Catholic scholars held that there had never existed a so-called "Church Fathers' Communism", nor had the Church fathers ever advocated the common possession of wealth. They preferred to interpret John Chrysostom's serm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and moral exhortation rather than from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The debates extended from John's sermon embodied the fierc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rend of socialist thought and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two sides in the disputes often took well-intentioned and open attitudes towards each other, but both sides, to some extent, misunderstood or ignored some key elements of each other's position in their dialogues. As a result, there emerged much more conflicts than mutual understanding.

Key words: John Chrysostom (约翰·克里索斯托), primitive Christian church, common possession of wealth, Karl Kautsky (卡尔·考茨基), Rosa Luxemburg (罗莎·卢森堡)

(责任编辑 郑 园)